

# 第一章 理论与方法

## 第 1 节 民间经济外交的理论与现实

### 1 民间经济外交的概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中，中日关系是非常奇特的。它有着其他国家间所不具有的数千年文化交流和吸收的历史遗产，又背负着同样是其他国家间所没有的极端残酷的战争的重负与伤痕，而这两者在今天依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由于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意识形态的多样性，中日关系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双边关系，而是受着中国、美国、苏联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日美、日台和美台关系的制约的。同时，在这一正式的政府间的政治外交关系之外，还交织着大量的非正式的或者称为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关系，而后者又往往对前者的决策具有某种程度的影响。特殊的历史遗产、复杂的多边关系以及政府与民间关系的相互渗透，是维系战后中日关系的三大纽带，也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课题。然而，迄今为止，在国内外的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以及历史研究中，人们注重较多的是宏观的国际政治学或以政府为代表的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关系，对于国与国之间的民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则少有专门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其实，促进战后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动力来自民间。在战后纷繁多变的冷战体制下，政府和各国执政党的政策是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变换的，但来自民间的推进中日和解与和平的力量却是持久永恒的。据说，50年代初期日本有位著名学者说过：“中国与日本之间，永远有一座没有修筑起来的桥梁，哪一天能够把这座桥梁修筑好，哪一天中日两国的国民，才算是能够有路可走，才能够直接的携起手来”。<sup>①</sup>如果说，1972年中日邦交关系正常化的实现算是在中日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的话，那么这座桥梁主要是由两国的民间人士通过贸易等经济交流渠道修筑起来而由两国政府在政治上竣工的。如果说，今天中日之间仍有一条相互理解和展开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的话，那么这座桥梁的主要维护者仍是两国的国民。因此我们认为，要对战后中日关系史冷静地进行实证研究并在自己的研究中建立有说服力的分析，提出能得到广泛承认的新的理解，必须抓住两条基本线索，一是两国的经济关系，二是两国的民间往来，而民间的经济交流活动对外交的影响即民间经济外交又是把握战后中日关系史的一把钥匙。

本书所要发掘的正是这把钥匙，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两条基本线索。在导入正式的分析之前，我们首先要对有关民间经济外交的几个理论问题作一说明。

### (1) 民间外交

民间经济外交这一概念包括“民间外交”和“经济外交”两个侧面。“民间外交”又称国民外交或人民外交，是指与政府没有直接关系的民间人士或民间团体所从事的对国家的外交会产生影响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交流活动，如贸易、体育、艺术、学术、文化等

张国良：《中国与日本之间》，《自由阵线》周刊(Freedom Front)第10卷第10期，第8页，1952年7月23日，九龙出版。

的交流。

在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民间外交当然不是正式的外交渠道，它是属于非正式外交渠道的一种。<sup>①</sup>非正式的外交是在国家间的关系因战争等原因恶化、断绝的时候，或外交交涉触上暗礁的时候不得不采取的一种接触形式，于是，两国或多国政府之间设立秘密接触渠道，进行非正式的交涉，待交涉条件成熟时再发展成为正式的交涉。有时，没有从政府那里获得交涉指示或交涉资格的民间人士依据自己的思路，为疏通关系、缓和气氛、达成妥协而积极开拓交涉渠道或介入交涉，最后也可能发展成为政府间的交涉。前一种情况在中美建交的过程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后一种情况则在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表现得比较突出。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迄中日邦交正常化的 23 年间由于《旧金山和约》和《日华和平条约》的关系 中国和日本之间事实上已经没有正式的外交渠道了。在正式的外交渠道被关闭之后，人们开始感受到外交通道多样化的必要。政府间的交涉既已不能，但有关财产、侨民以及过去和将来的经济关系等事务性的问题又不得不处理 这就需要通过非正式的外交渠道 主要是民间‘接触’这一渠道予以协商和解决。

这里 外交上所谓的‘接触’，一般是指人和人之间所进行的旨在疏通国家间（两国或两国以上多数国家间）关系的交涉或传意的活动。接触者可以是外交官或其他具有对外接触资格的公职人员，也可以是没有正式对外接触资格的自愿人员，接触既可以只是简单的传达情报与意向，又可以是试探趣旨、进入谈判、讨论实质问

<sup>①</sup> 非正式外交的种类有很多，如秘密外交、幕后外交、院外集团或走廊（Lobby）外交、忍者外交、浪人外交、民间外交等。从事非正式外交的人有密使、秘密联络员、走廊客或院外集团活动者（Lobbist）和民间人士。就民间人士的作用来说 人们多称他们为和平使者、架桥人、开渠人、掘井人等。

题、争论与妥协、取得共识或中止谈判等。国家间的接触当然也包括正式接触 (Formal Contact) 和非正式接触 (Informal Contact) 两个形态,日本有的学者还将非正式接触分为正式—非公开性接触、非正式—非公开性接触和非正式—公开性接触三种类型,并据此对战后中日关系中的非正式接触者进行了初步的分析。<sup>①</sup> 不管这种概括是否全面、准确,它的确为我们的研究展示了一种新思路。

民间的或非正式的接触、交涉或外交是需要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的。相对来说,中日两国都比较重视民间团体在国家对外交涉中的作用。政府也容忍、承认、支持或鼓励民间人士的非正式接触,这是战后中日民间经济外交和文化交流发展的必须的土壤。可以说,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前,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或交涉多用的是正式和秘密外交的方式,即正式—非公开性或非正式—非公开性的接触。由于缺乏长期的民间外交的渠道,致使尼克松在急于想和中国改善关系时,为找不到接近中国的渠道而犯愁,而中国方面也对美国的举动有点措手不及。战后中日之间的接触和交涉基本上是属于非正式—公开性的,参加中日民间外交的人没有从政府那里获得正式的接触资格,但却实施接触和交涉,有时要将接触的过程公之于众,有时还将交涉的结果和成果报告给政府,以求得支持。他们代表一定的政治势力和一部分经济团体的利益,但他们绝不是只为自己的团体着想,他们传达自己的或自己国家的见解,主动听取对方的见解,从事务实有效的外交活动,为正式的公开的交涉创造着坚实的基础。

日本的“议员外交”就是如此。战后活跃在国会中的日本各个政党的议员在中日关系发展的过程中都曾发挥过各种各样的作

〔日〕西原正:《日本外交与非正式接触者》 别枝行夫:《战后日中关系与非正式接触者》 均见《国际政治》第 75号,1983年10月。

用，社会党曾展开“在野党外交”，推动中日两国之间的接触和交流。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内部因中国问题始终分为两派，其中主张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的人与社会党、公明党等联合起来，在中国问题上超越党派的利益展开了“超党派外交”。国会议员是政治家也是经济界或实业界某一领域的代表，1972年以前他们几乎都是以私人资格、民间团体或非政府代表的身份与中国接触和交涉的，因此我们认为，政府官员、国会议员等国家公务员通过非正式的外交渠道所从事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外交活动也属于民间外交这一范畴。

民间外交使中日两国之间接触的渠道总是畅通的。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前，民间工商企业界人士或非正式接触者是中日交涉的主要担当者，他们在因经济文化关系而往来于中日之间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一种外交使命的担当者。这样，当田中角荣决心和中国改善关系时，他就不像尼克松那样为找不到与中国接触的渠道而担心。可以说，没有这种持续不断的民间外交，就不能指望中日邦交正常化能顺利地实现，外交的原动力存在于国民与国民的交流之中，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现在民间外交这一非正式外交渠道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并力求发挥其在国家对外交流中的作用。这在当前先进国家之间关于贸易磨擦的交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根据我们的抽样调查分析，现在较多的人已比较普遍地倾向于认为，民间外交活动，应该被看成是国家间的一种正式的外交渠道。<sup>①</sup>我们在河北农村采访时有人还具体对笔者解释说：“不管是政府的外交渠道还是民间的外交渠道，其实都是一体的。因为政府也是建立在人民的基

对于“民间外交现在事实上已经变成国家间的一种正式外交渠道了”这一说法，笔者对540人的调查结果显示，持赞成意见的占40%，持反对意见的占56.1%，回答不知道的占3.9%。虽然赞成这种说法的仍居少数，但较之以前人们对外交的一般理解，其变化就是可以感触到的。

础上的或者是反映人民意志的。当大多数的人民愿意、要求与中国建交时，作为政府还能怎样？政府的工作人员，也是人民选出的<sup>①</sup>。这一解释虽然与我们分析问题的角度和方法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路是正确的，它说明在一般人的理解中，无论什么样的社会体制，政府的外交活动都必须反映民众的要求或顺应舆论的潮流。这可能正是民间外交的潜力之所在。

## (2) 经济外交

“经济外交”一词的含意比较多，它可以是指外交活动中与经济有关的问题，也可以是指以经济问题为对象的外交活动，或者是指以经济问题为手段的外交活动。一般来说，在人们的理解中，经济外交就是关于国家间经济关系、经济问题交涉的外交活动，有的人还具体将其定义为“政府和民间所进行的关于经济问题的谈判和履行契约的过程”。<sup>②</sup>

冷战时期，一个国家的外交行动虽然并不都与现实的经济利益有关，但外交和经济总是难以分开的，眼前的和将来或长远的经济利益常常影响到国家的外交政策。日本一贯是将经济外交作为外交政策的一部分来对待的，这更表现出经济利益在外交决策中的地位，从而也使得日本财界或工商企业经济界的人的作用举足轻重。其实，财界在战后日本的经济外交活动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不了解财界的动向，就不能真正理解日本的外交为什么会从向美一边倒中脱出，为什么在没有正式外交的中日之间民间的经济交流能不断发展，为什么会有日苏接近，为什么日韩问题的解决会早于日中问题的解决等等。

① 1994年12月27日，在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的采访记录。回答者42岁男，籍贯河北省，职业为信用社干部。

② “Introduction”, Chae-Jin Lee: *China and Japan: New Economic Diplomacy*.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4.

就一般的国际关系理论而言，经济外交与民间外交一样也不是正式的外交，更不是常规的或正式的对外交涉渠道。外交属于政治，是一个国家政治的对外延续。它一般由政府出面制定政策，由民意代表机关如国会、议会或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并确认。但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在和平环境下各国均以发展经济为急务的缘故，经济外交已经或者说正在变成为国家间的一种正式的外交渠道，已经或者说正在成为政治外交关系的一部分而被纳入政治家、外交家和学者的视野。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也证明了这一点。

众所周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40 年代中期以迄 70 年代初期的 20 多年间，国际关系的最大的特点之一是意识形态曾极大地影响了各个国家间的政治外交关系。东西阵营的对立是意识形态造成的，各个阵营内部的分裂或分化也是由对意识形态对立的不同理解和态度引起的。可以说，意识形态作为一种看不见的超权威的力量左右了各国在战后几十年间的对外政策，这是前所未有的奇特现象。中日两国分属东、西两个不同的阵营，大致说来，在 70 年代以前，决定中日两国的外交决策和国家间政治外交关系的主要因素基本上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不同。不过，值得说明的是，在中日两国的政策决策者的心目中，国家的利益（包括地区和平、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等）其实是首要的，意识形态的取舍有时是不得已的选择。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理解战后中日之间务实关系发展的动因。

70 年代以降，特别是 80 年代后期冷战结束以后，国家间意识形态的对立情绪明显地缓和了，经济利益在国家对外政策的决定过程中，逐渐居于主要地位。我们在对 540 名普通的中国人所做的抽样调查的结果表明，有 64.1% 的人认为，在现在的国际环境下，当我们考虑中日关系时，经济因素是较安全保证和意识形态两个

因素更为重要的因素,有 81.3% 的人认为今后中国与日本之间应该在经济方面加强合作。一位 57 岁的农民还对笔者说:“以前考虑中日关系时安全保障应该是第一,但日本侵略中国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还是经济关系比较重要”。<sup>①</sup> 可以预计,在今后较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经济因素将进一步深刻地影响中日两国的关系。

### (3) 民间经济外交

根据上述我们对“民间外交”与“经济外交”这两个概念的诠释,我们认为如果要给民间经济外交下一个定义的话,可以这样表述:“民间经济外交”是民间经济界人士、民间经济团体或非正式交涉者之间所进行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国际经济交流活动。<sup>②</sup> 它是非常广泛的外交活动领域中的一部分,是相对于正式外交与政治外交、军事外交等而言的。

## 2. 中日民间经济外交的主要团体

### (1) 日本方面

日本是一个非常注重经济外交的国家。早在 1951 年日本的部分学者和政界、财界的人士就结成了“经济外交研究会”并在外务省经济局的支持下创办了《经济与外交》杂志,专门探究经济外交问题。<sup>③</sup> 1957 年 9 月日本政府外务省在战后首次发表的外交蓝皮书《我国外交的近况》中正式提出了经济外交的口号。蓝皮书指

<sup>①</sup> 1994 年 12 月 29 日,在河北省栾城县寺北柴村的调查记录。回答者 57 岁男,籍贯河北省,职业为农民。

以下两学者的定义可作参考,〔日〕木村昌人:《日美民间经济外交(1905—1911)》,庆应通信,东京,1989 年。〔日〕三泽润生:《对外政策与日本“财界”》,载细谷千博、绵贯让治共编:《日美对外政策决定过程的比较》,东京大学出版社,东京,1977 年。

《经济与外交》1954 年 12 月以后改名为《海外贸易情报》,1957 年 6 月再改名为《海外经济事情》。1959 年 8 月又恢复原名《经济与外交》,1988 年 10 月与《月刊国际政经情报》合并,出版《外交论坛》(Caiko Forum)杂志至今。

出：“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各国相协调”和“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是日本外交的三大原则，而根据这些原则，当前日本外交的三大重要课题就是“与亚洲各国善邻友好”、“经济外交”和“调整对美关系”。<sup>①</sup>

对于前两大课题 蓝皮书分析说：“关于与亚洲诸国的关系 并不仅仅是因为我国与之在地理上属于同一地域，而且还因为与其中有一种和人种、文化的亲近感相联结的强韧的心理纽带，前述‘亚洲一员’的原则就是依此提出来的。对我国来说，推进与这些国家的善邻友好关系是当前的第一个重要课题。”

“其次，对于信奉和平主义的我国来说，要使挤在四个小岛上的九千万国民的生活改善向上，发展经济与培育国力，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和平的手段对外推进经济力量。所以，适应国民经济需要的以发展对外经济为目的的经济外交，就是赋予我国外交的第二个重要课题。”

“将两者结合起来看，亚洲诸国在经济上与我国有相互补充的紧密关系。这些国家的大多数独立时间不长，他们拥有巨大的资源但却未能充分地推进经济建设。必须说，在这方面，他们与拥有高技术和工业力的我国进行合作的余地是非常大的。而且，在从事导入亚洲以外的资本和技术的斡旋工作的同时，政府与民间可以齐心协力，有计划、有重点且机动地开展经济合作。如果通过这种合作而能推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的话，那么，其结果就并不仅仅是这些国家自身经济的发展，其与我国的经济交流自然就会增大。这对于致力于经济外交的我国来说，其意义也是极大的。的确，在可以说没有亚洲的繁荣、和平与进步就没有我国的发展这样的形势

〔日〕外务省编：《我国外交的近况》第1号，1957年9月第7页。

下这样的经济合作也可以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外交的紧要大事。”<sup>①</sup>

上述文献反映出，日本政府开展经济外交的基本理念就是恢复和打开因战败而失去的世界市场，经济外交政策的重心或主要对象是亚洲各国，但同时也兼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例如，1957年即经济外交政策提出的当年，岸信介内阁就将财界的主要人物小林中（原开发银行总裁）涉泽敬三（原大藏大臣）伊藤武雄（当时任大阪商船社长）堀田庄三（住友银行行长）四人分别派往东南亚、中南美、中近东和欧洲担任巡回大使。1959年永野重雄也被派往苏联和欧洲担任巡回大使。由政府派遣的财界人组成的经济代表团或使节团更是走遍世界各地，而不管其前往的地区实行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还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值得一提的是，财界人在战后日本对东南亚各国以及韩国的战争赔偿的交涉中发挥了政府无法发挥的作用。他们将赔偿和投资巧妙地结合起来，成功地使日本经济打入了东南亚市场。60年代以来日本的海外经济合作活动，其实也是展开经济外交的一种形式。因此，日本学者得出结论说，战后日本的政治是保守党和财界共同掌握的，可以说财界是“一个看不见的政府”。<sup>②</sup>

与战后中日民间经济交流有关的经济团体几乎涉及日本财界的各领域。从总体上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代表日本财界的四大经济团体（即经济团体联合会（简称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简称日商）、日本营者团体联盟（简称日经联）和经济同友会。他们由日本最有实力的大公司、大财团的总裁、会长或社长等组成，与政界保持着紧密的关系，有的人可以说是政府中的财界人。四大经济团体主导着日本的经济，对内政和外交都有发言权。他们在战后

〔日〕外务省编：《我国外交的近况》第1号，1957年9月第9页。

〔日〕加藤义宪：《财界》第43页，河出书房，东京，1966年。

日本的经济外交中，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如藤山爱一郎、永野重雄、稻山嘉宽以及关西财界的佐伯勇、中司清等在邦交正常化之前都已参与了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活动。

二是从事中日贸易和经济交流的民间或准民间经济团体。主要有：

A，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 10 团体，即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东京，1954 年 9 月成立）、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关西本部（大阪市，1954 年 11 月成立，现名日中经济贸易中心）、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京都总局（京都，1954 年 12 月成立）、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北陆支局（金泽市，1955 年 1 月成立）、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神户支局（神户，1955 年 3 月成立，现名神户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东海总局（名古屋市，1955 年 6 月成立，现名东海日中贸易中心）、西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北九州市，1967 年 2 月成立，现名西日本日中贸易中心）、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本海支局（新潟，1971 年 4 月成立，1992 年解散）、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冲绳支局（那霸市，1972 年 12 月成立）和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北海道总局（札幌，1973 年 6 月成立，现名北海道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在日本这样一个小国家，以促进国际贸易、特别是中日贸易为宗旨的经济团体居然有 10 个，这在各国都是极其少见的，它足以反映日本需要发展国际贸易的紧迫性。这里，值得说明的是这些国际贸易团体虽然在名称上是统一的，甚至冠以本部、支部、支局等名称，其实在人事和财政上是完全独立的，是相互独立的经济团体，不过他们在基本理念和相互合作方面是共通的。

B，民间工商业者和官方、半官方人士组织的非官方经济团体，如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促进日中贸易地方议员联盟全

① 1995 年 2 月 28 日采访平井博二先生的记录，采访地点东京都东久留米市。

国协议会、中日贸易促进会、日中输出入组合、日中渔业协议会等。

C 专门从事 LT 贸易与备忘录贸易的务实的经济团体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及其下属的各种行业团体，如日中机械贸易协议会、日中农药贸易协议会、日中钢铁交易联络会、日中饲料杂豆输入协议会、日中化工品贸易协议会以及盐安肥料协会、特殊钢输出恳谈会等。

D 日中经济协会、日中海运输送协议会等。

大致来说，中日关系正常化以前，A（50年代与60年代成立的团体）至C所发挥的作用比较大，而在A中大阪和东京的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的活动最有实绩。1972年以后以迄现在，A和D的作用比较大。

此外，日中友好协会（东京，1950年10月成立）、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东京，1956年3月成立）、日中协会（东京，1978年成立）、日本贸易振兴会以及东京、大阪、神户的华侨总会等也积极地参与了中日经济交流活动。如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在中国举办展览会时，因为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申请获得政府的资助，乃通过日本贸易振兴会提出申请。

三是具体参加战后中日经济交流或贸易的商社和厂家，如大的商社包括三菱商事、三井物产、住友物产、伊藤忠商事、丸红饭田、日棉实业、安宅产业等，他们最初都是分别通过自己的替身公司参与中日经济交流的。著名的中坚或专业中小商社包括东京贸易、共荣商事、吴山贸易、神荣生丝、新生交易、东京丸一商事、东工物产、野村贸易、西日本贸易等等。参加中日经济交流的著名厂家主要有富士制铁、八幡制铁（后合并为新日铁）、日本钢管、川崎制铁、神户制钢等钢铁公司，三菱重工、住友化学等重工业及化学肥

① 1995年2月13日采访平井博二先生的记录，采访地点东京都东久留米市。

料公司以及与造船、电机电子、纺织纤维、纤维机械、食品医药等有关的公司。以上的商社和厂家都是中日经济交流实际事务的担当者。此外，与中日经济交流直接有关的银行、船舶、运输、仓库、检查、保险、旅行等方面的企业也属于这一范围，如主要的有东京银行、富士银行、日本海汽船、日新运输、东京船舶、检定新日本社、日产火灾海上保险、千代田火灾海上保险、日中旅行社、日中和平观光等。

50年代以来，日本的大部分经济团体与台湾也保持着不断的民间或准民间的经济往来关系。1972年之前，在日台经济交流方面，发挥主要作用的是日华协力委员会（台湾方面的对等机构称“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它的主要参加者有官方和民间的经济界人士。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日台之间民间的或准民间的经济团体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如1972年12月设立的财团法人交流协会（与之对应的台湾方面的对等机构是亚东关系协会），1973年3月在自民党国会议员中成立的“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等，在处理日台实务关系、促进经济交流方面都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从1973年11月开始，每年一度分别轮流在东京和台北召开的东亚经济界人士会议（台湾称东亚工商企业者会议），在维系和发展日台间的贸易、投资与技术、观光以及金融的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书对于日本与台湾之间民间经济团体的经济活动只作为背景介绍，不作专门的论述）

## （2）中国方面

中国习惯上喜欢用民间交流、国民外交或人民外交等来描述民间外交。在70年代前期以前，对于战后的中日民间经济外交，人们比较注重于这种交流的政治意义。从政治上考虑问题是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最基本的思考方式。台湾有的驻日记者也倾向于从政治方面考虑问题，他们早在60年代初就敏感地发现，中日之间的

民间经济交流活动，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种建交行动，乃从 1964 年 5 月开始称战后中国与日本的民间经济交流为“经济外交”。<sup>①</sup>中国的对日民间经济外交团体主要是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渔业协会、中日友好协会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华全国总工会等也在一定的时期内参与了中日经济交流活动。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前，具体担当中日经济交流实际业务的企业主要是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公司及其属下的经营各类商品进出口业务的专业公司如粮油食品、轻工业品、五金矿产、机械仪器、工艺品、土产、化工、技术等进出口公司时有八大贸易公司之称。在 50 年代中叶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完成之前，一部分私人进出口商也直接参加了中日民间贸易，如天津的荣茂昌行股份有限公司、和生贸易行、天津大成实业公司、上海的元昌华行、东西营业有限公司、通润行、广州的协泰隆行、益昌行、华南企业公司等。

在台湾官方对民间的经济外交活动也很重视。他们认为“外交政策之实行，有赖于全体国民之支持与推动，故国民外交在近代历史中乃有特殊重要之地位”。<sup>②</sup>以吴铁城为理事长的“中国”国民外交协会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成立的。至于其与日本的民间经济交流团体，1972 年以前比较活跃的除前面提及的“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之外，还有“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和日华经济促进委员会。需要说明的是，“中日”文化经济协会和日华经济促进委员会是台湾单方面设立的，而“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则是日本与台湾双方共同设立的，不过关于这一民间经济组织能发挥的作用，日台双

司马桑敦：《中日关系二十五年》，第 143—158 页 联合报社台北，1978 年。

〔日〕富山荣吉：《中国对外贸易管理机构的研究》，载《日中贸易季报》，1956 年第 1 卷第 1 号（创刊纪念号）日中输出组合发行 东京，1956 年。

《中华民国年鉴》（1952）第 353 页。

方所持的观点和立场不是完全相同的。对此 张群明确说过“,当初我们的目的,在运用这一个组织来与政府外交工作相辅相成,以辅政府间关系之不足,希望日方委员能对其政府决策发生影响力,因之我们的想法是偏重政治性的。而日本方面,则在每次会议中,总是设法逐渐减低其政治性 即使不能避免 也要极力予以冲淡”,<sup>①</sup>分歧是很明显的。等到 1972 年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中日”合作策进委员会和日华协力委员会已名存实亡,不再开展任何活动。在实际的事务中,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亚东关系协会和一年一度的东亚工商企业者会议(即日方所称的东亚经济界人士会议)。

### 3 民间经济外交的形态

经济交流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即商品、资金、技术和劳务的国际运动。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商品的国际运动始终是经济运动的基本形式,资金、技术、劳务的国际运动往往是伴随着商品的国际运动而进行的。商品运动是资金、技术、劳务国际运动和交换的基础,是国际间经济交流发展水平最主要的标志。这种商品的运动发生在国与国之间就是国际贸易。可以说,贸易活动是经济交流活动中最古老、而且迄今为止依然是最重要、最大量的活动形式,因而它也就自然地成为民间经济外交活动的主要形态之一。1945—1972 年间,中日民间经济外交的形态基本上有以下几种:

#### (一) 贸易经济

当代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市场,而国际贸易是连结世界市场的重要纽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约有 30 年的时间,虽然东西方阵营尖锐对立,两种意识形态水火

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第 232 页;“中日”关系研究会 台北,1980 年。

不容，但双方依然可以进行商品交换和贸易往来。不过，这种贸易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西方国家有一个特殊的名词，即“东西贸易”。不言而喻，这里的东方指的是苏联、中国和东欧、朝鲜等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方指的是实行自由经济的资本主义国家。战后中日之间的贸易就属于这种“东西方贸易”的范畴。

国家间的贸易一般分为政府贸易 (Trade by Government) 和民间贸易 (Non-Government Trade) 两种。政府贸易，又称国营贸易，指卖方或买方为政府机构或国营企业的贸易，一般限于某些特定的商品，如属于国家专卖的物资 (烟草等)、关系国民健康的物资 (酒精饮料等) 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武器和其他战略物资等。它是在保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间进行的，在国家间正式外交关系还没有建立以前，贸易一般由民间贸易团体出面进行，这种不同国家民间企业之间的贸易，被称为民间贸易。大致说来，70 年代初期以前，中日之间的贸易属于民间贸易，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的制约，中日民间贸易基本上全部采取了以货易货的方式。

易货贸易 (Barter Trade) 是国家或地区间用货物相互交换的属于对等贸易的一种方式。它首创于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危机期间的德国，用以克服因外汇支付困难而形成的贸易障碍。其特点是进口与出口相结合，双方都有进有出，相互换货，可以一种对一种，一种对多种或多种对多种，力求换货的总金额相等，不用外汇支付。如有少量差额，也可以用双方可接受的货币结算。这种贸易方式的局限性是，手续比较烦琐，交换的货物不易对口，谈判往往持久且难以达成协议。因此现在已较少采用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第一个 10 年期间，即 50 年代，中日两国民间经济团体先后签定了四次民间贸易协定 (其中有的协定延长过一至三次)，从 60 年代开始又以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这两种在国际贸易关系史上极其特殊的贸易形式来展开经济往

来并持续了十一、二年。这是从 1949 年至 1972 年的 30 多年间两国民间贸易的最重要的几种形式，也是我们把握战后中日民间经济外交的基本点。1972 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实现之后，两国之间贸易形式变成政府与民间并进了，支付方式也实现了多样化，与世界各国的贸易体系基本上一致起来。对于目前经济还不发达的中国来讲，在贸易过程中拓展商品的进出口，同时积极地利用外资并引进先进技术，是赶上经济发达国家的重要途径。

## （二）举办展览会

展览会是以外交政策为背景，以市场开发和商品交易为目的的，一般都会得到政府的保护和承认。对经济界来说，举办展览会是一个绝好的开展民间经济外交的机会。具体到中日之间的民间经济交流来说，举办展览会还具有特别的政治意义，即中国可以通过展览会把握日本乃至西方国家技术发展的水准，制定本国的近期与长远的经济发展规划，同时展示本国的经济建设成就，让对方更加了解自己。中日两国之间举办的展览会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即综合展览会、专业展览会和个别企业举办的展览会。1949 年至 1972 年间，日本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举办过八次大型展览会，综合性的计有 1956 年的北京·上海日本商品展览会、1958 年的广州·武汉日本商品展览会、1963 年、1965 年和 1969 年的北京·上海日本工业展览会，专业性的展览会计有 1967 年的天津日本科学仪器展览会、1972 年的上海日本工作母机展览会和天津日本建设机械展览会等。<sup>①</sup>中国也在东京、大阪、名古屋、北九州等地举办过数次有关中国商品和农业、工业产品的展览会，主要有 1955 年的东京·大阪中国商品展览会、1964 年的东京·

有关展览会的作用和详细情况，请参见〔日〕平井博二：《日中贸易的实务知识》，189—197 页，日本实业出版社，东京，1972 年。